

追懷朱家驊老師

李崇年

朱駟先（家驊）先生曾長南京中央大學，中央遠溯及前身的兩江高等師範、南京高師、東南大學、第四中山大學、江蘇大學，先後校長近十人，均係名師，而且各別對於中大均有值得懷念的貢獻。我此刻特別提出駟先老師，因為他有可以令人特別尊敬而永遠不忘之處，並不僅因為他對我一己的知遇和愛護而已。

我在民國十九年畢業，駟公就在那年出長中大，正值多事之秋，而今回溯起來也不必諱言，中大需要改革和進步的處在，的確不少。朱先生就在這短暫的一年多之中，進行了不少的革新，為後任校長立下了繼續求發展的穩定基礎。

舉例言之，中大原有興建大禮堂的倡議，但是不幸因故中輟。他立即用國民會議的名義請中樞撥款，廣續建造，作為大會議堂，日後即作為中大的大禮堂，並且迅速完工。五月五日國民會議開幕制定中華民國約法，便是在那座宏偉的建築中舉行的。

又如，在他的任內，適逢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與北京大學簽訂「合作研究特款辦法」，提高教授待遇，乃致中央原有的名教授，多為北方大學羅致而去。朱先生曾努力設法，陸續延聘到郭任遠、沈剛伯

、徐佩琨、顏德慶、蕭一山諸位先生，都是當時英年有爲而博學多才的名學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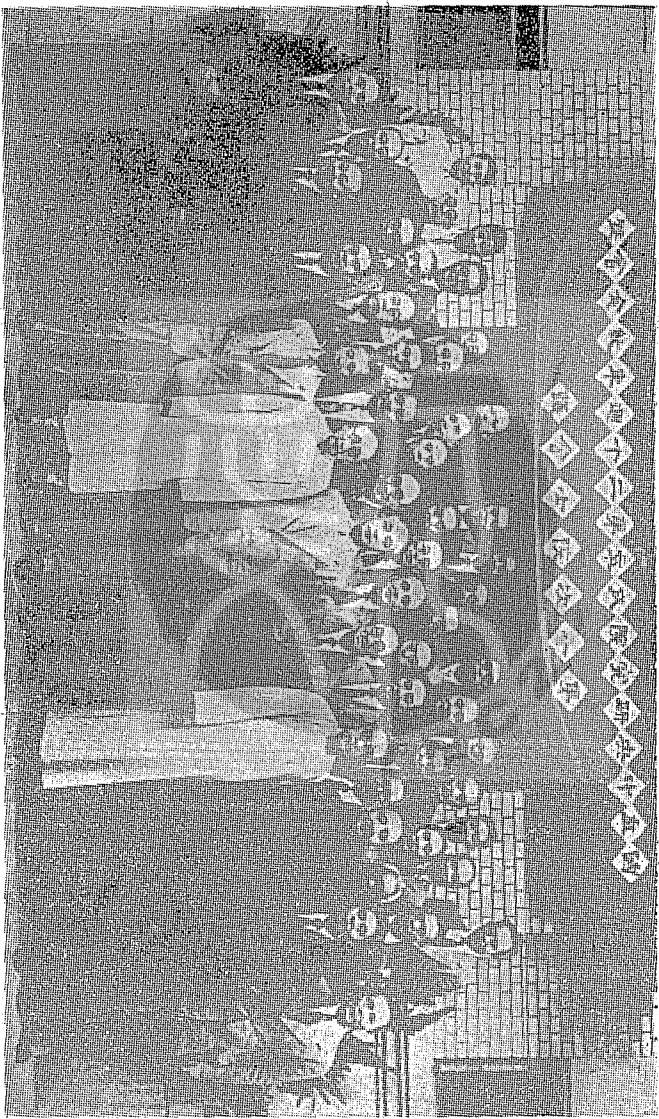
同時又洽安美國洛氏基金會在上海捐贈醫學院楓林橋校址。我們畢業同學是一樣的心理：人雖離校，自然仍有割不斷的依戀，深慶中大領導得人，不斷進步，全體畢業校友有光，大家都深爲敬佩。

次年（民國二十年）駱公就任教育部長，他對於中大先後各期畢業同學，愛護與提攜，則尤甚於其長校之日。羅家倫校長卽是朱部長任內所派的，此後十年是中大發展最速的時代，蔚爲全國真正的中央學府

◎

二十四年春，我從英倫回國，立刻接到許潛老（炳堃）的通知，說朱先生約我談話。當我以一個久別的子弟重見家長的心情和他會面時，我將一切毫無隱藏的報告。他說：應邀從事地方行政，互有利弊，最可惜的是英年有爲之時，浪費於應付紳士與零細事端，寢假乃至銳氣全消。於是我詢問，能否有機會派去蘇聯與日本考察一、二年，同時代的青年皆知道中國外患根源所在，必須深入了解謀求對策。

朱先生認爲這是對的，不過彼時無適當名義。接着我們便談到學術研究或從政的問題，當時他雖兼代中央政治會議的祕書長，但是他已經知道汪精衛別有用心。至於中央研究院，以他與蔡元培院長和丁文江總幹事的關係，雖可進言，但不妨稍緩。說到最後他懇切希望我暫留交通部，爲他服務，因爲這是一個工有效，立竿見影的機構，而且事與全國政治、經濟以及軍事各方面有密切關係。三年前他自己奉命兼長交通部，也是事先自己都毫不知情，等於被徵召的。他又說，公餘有暇，並可兼課，不致與學問脫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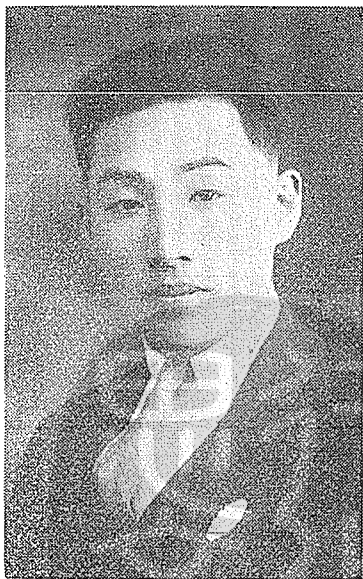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央研究院第一屆起右排前，念
 士院屆三第起右排前，念
 會議士院屆三第起右排前，念
 代長院代長，適朝人四第，華書
 與（中正排前）驊家長院代長，華書
 出與（中正排前）驊家長院代長，華書
 席出與（中正排前）驊家長院代長，華書
 會出與（中正排前）驊家長院代長，華書
 全體出與（中正排前）驊家長院代長，華書
 合影出與（中正排前）驊家長院代長，華書
 留合影出與（中正排前）驊家長院代長，華書

追懷朱家驊老師

我就如此這般的像一個學生爲校長所留用了。當時交通部人才濟濟，張道藩、樓光來、顏任光、高廷梓、尹仲容、徐學禹諸君，均能頭角崢嶸。我由此結識了許多異日的國家棟樑，也體會到臨公拔用人才的雅量。

朱先生在短短的兩三年內，已整頓了航政與電政，建立公路網、開辦航空事業，推廣邊疆郵政及儲金，澈底改組招商局，收回國營，又以中英庚款支持鐵道部，接通粵漢鐵道中間的株州到韶關一段。



本文作者李崇年先生民國十九年中大畢業時留影。

更值得提筆直書的是在抗戰烽火忙亂之中，不忘堆集在南京朝天宮無人問的一萬幾千箱故宮文物，電呈蔣委員長飭令南京衛戍司令唐生智，設法搶救疏運，所有費用悉由中英庚款董事會緊急墊付。委員長遂命侍從室調集卡車協助，又知照俞飛鵬次長備船舶，這批古物乃獲安運後方。後來三十八年大陸淪陷前夕，又是朱先生呈報蔣總統派海軍船艦，再將這批古物，由南京、上海安運台灣。現在外雙溪故宮博物院所保藏陳列者亦即這批古物。總統蔣公日理萬幾，仍

分神處理古物搶運。蔣公對於中國文化維護的苦心，誠非常人所能及。

戰時，昆明逐漸成爲大後方對外交通的中心，過往國際政治人物甚多，我經常奉到指示，作種種的招待。例如今日印度的許多政要，當年也曾得到我和裴存藩兄招待。朱先生也不時托我們接待與他有關的國外政治外交人員。因此我們並不因地理上阻隔而見疏遠。

朱先生曾任教育部長又兼中央黨部祕書長、中央調查統計局長及中央研究院總幹事，對於學人以及流亡學生十分關切。流落在雲南的或是在雲南過境的，朱先生經常囑咐我照護。當國立同濟大學棲遷雲南停留時期，我且奉朱先生之命，兼任該校的總務長。

我在奉調西北服務以後，經常接奉指示，其中協助西北各大專學校、學人與學生的事件甚多，可見朱先生不管身任何職，始終以代學術教育界服務爲最大的興趣和責任。

大陸淪陷以後，我來台在實業界工作，其中的辛苦，鮮向外人道及，而朱先生則不時存慰。我目睹他專心於中央研究院的再生，與學術研究的推進，似乎是復返他少年時代的本行了。

自四十六年以至五十二年先生去世，這六年，是朱先生一生當中，澹泊寧志的時期。他除了繼續領導聯合國中國同志會爲國家盡國民外交的職責，以及宣揚我國傳統政治思想而外，對於他個人的處境，迎面春風甘之若飴。他的修養達到純靜平淡的昇華境界。

如今又匆促度過了十三年。在這期間，我個人倒好像越發爲企業所束縛，業務日繁而無法跳去圈外的

模樣。我自信尙能避免「玩物喪志」，然而也慢慢體會到，人生多少有爲造物所安排而不能自決的地方。朱先生早年原以從事學術研究工作爲其最高興趣，可是上蒼則注定，他得盡力於國家的建設，乃至最後，他老人家會謙虛的對我談起，他因從政而廢學爲可悔之事。記得我當年自英歸國，也曾向他提過學術工作的願望，何期此後的途程曲折，雖有時也在學府兼課，又在業務需要範圍以內也經常接觸書本，尋求新知的，可是與當初的懷抱，則相去太遠了。

而今，在駱先老師辭世十三年以後，學生們也垂垂老矣。不時回憶往事，自慚在爲人做事方面，未能學得師德於萬一。

十三年前我的師兄楊君樹人爲文紀念駱公，曾說他老人家值得永久懷念的，第一在於他是典型的愛國者，第二在於他是寬宏的長者，第三在於他極其尊重讀書人。我完全同意這看法。自維蒲櫛，生平以忝列中大門牆爲榮，自然也以有朱駱公這樣傑出的學者與政治家担任過中大校長爲榮。尤其曾親受教誨，景仰風範，終身難忘。

（選自中外雜誌廿一卷二期六十六年二月號）